

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
Excellent Achievemen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

李晓峰 著

被表述的文学：

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

BEI BIAO SHU DE WEN XUE
20 SHI JI ZHONG GUO WEN XUE SHI SHU XIE ZHONG DE
MIN ZU WEN XUE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李晓峰 著

被表述的文学：

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

BEI BIAO SHU DE WEN XUE
20 SHI JI ZHONG GUO WEN XUE SHI SHU XIE ZHONG DE
MIN ZU WEN XUE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表述的文学：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 / 李晓峰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3. 10

ISBN 978 - 7 - 5161 - 3333 - 0

I. ①被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史—研究—20世纪②少数民族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20世纪 IV. ①I209.6②I207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8738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曲弘梅
责任校对 张玉霞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(邮编100720)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发行部 010-84083685
门市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
印张 16.5
插页 2
字数 235千字
定价 49.00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-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由

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

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
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

大连民族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目 录

导论 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其功能	(1)
一 现代知识转型与文学地位的提升	(1)
二 文学史的形成及权力	(10)
三 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	(17)
四 中国文学史的功能	(24)
五 文学史知识建构的个人话语权力与国家意识 形态规约的调适	(31)
第一章 晚清国家转型与中国文学史发轫	(38)
一 民族国家的缺席:没有中国,何来中国文学史	(38)
二 京师大学堂与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	(45)
三 东吴大学与黄人的《中国文学史》	(60)
第二章 “五族共和”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	(82)
一 国家统制与个人思想的齟齬:新的民族主义 语境建构	(83)
二 文学观念的集体转型	(91)
三 二元对立民族观下的民族与民族文学叙事	(102)
四 种族同化主义知识权力下的民族与民族文学 叙事	(106)
五 中华多民族平等意识萌芽及文学史观的齟齬	(111)
第三章 “抗日救亡”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	(120)
一 “中华民族”的建构与意识形态	(120)

二	种族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悖忤: 梁乙真、陈遵统的中国文学史	(129)
三	相对的现代性:郑振铎的《民族文话》	(138)
第四章	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	
	文学史(上)	(148)
一	民族与民族文学的发现与“一体化”的社会 政治语境	(149)
二	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与中国文学史写作 范式的重新确立	(162)
三	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与民族文学	(171)
四	中国现、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与民族文学	(176)
第五章	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	
	文学史(下)	(191)
一	国家、民族、历史、文化新语境	(191)
二	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两类型:知识谱系的 延续与多民族文学意识的萌动	(202)
三	现当代文学史:知识分子个人话语权力的 放逐与“1+55”模式的延续	(212)
四	中华(中国)文学通史:文学史观与文学史 范式的突破	(226)
结语	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应该观照的几个问题	(233)
一	创作主体身份的多民族属性	(233)
二	多种文学传统与多种文学形态	(240)
三	多语种、跨语种与双语写作	(246)
	中国文学史参考书目	(250)
	后记	(258)

导 论

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 属性及其功能

当我们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出发，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高度，重新审视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历程和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状况，就会发现一个很少有人谈及，然而又不能回避和不能不厘清的问题，这就是，在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层面上，中国文学史的属性是什么？中国文学史的功能是什么？这些问题不弄清，就无法理解“中国文学史”从产生之日起就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，无法理解缘何国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传播提供制度环境和体制保障？缘何国家意识形态总是通过政策、组织等权力方式对文学史的写作进行干预？这些问题能否被认同并加以解决，对我们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 现代知识转型与文学地位的提升

晚清到民国的文学转型其实是理论先导的知识认知方式的转型，即对于“文学”这一观念的看法在外来文学观念影响下，发生了转移，最终导致整个知识运作模式的位移。在“文学，子游子夏”^①中，尽管“文学”作为词组已经出现，但是这个“文学”主要指修辞指事、喁对应答，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相距

^① 孔子：《论语·先进篇》，杨伯峻注为“古代文献”，“文学”在前现代时期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这个含义，见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10页。

甚远。前现代时期的士人并不看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文学，扬雄的话或许可以作为代表：

或问：“吾子少而好赋。”曰：“然。童子雕虫篆刻。”俄而，曰：“壮夫不为也。”或曰：“赋可以讽乎？”曰：“讽乎！讽则已，不已，吾恐不免于劝也。”^①

作为雕虫小技，文学并不被纳入到主流知识系统之中，至多作为指生命辞、主文谏的舟筏与工具。“轴心时代”^②以来，中国逐渐发展出一套源出于“道/一”的诸子百家的知识系统，“文学”的现代观念无从谈起。而先秦这套诸子百家的知识系统有个“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”的趋势。《庄子·天下》说：“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！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在？曰：‘无乎不在。’曰：‘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’‘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于一。’”又说：“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！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。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^③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，也认为它们是一致百虑、殊途同归：“‘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’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。”^④

刘歆在《七略》中，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，增“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”等为十家。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袭刘歆，并认为：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说：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

^① 扬雄：《法言·吾子》，见汪荣宝《法言义疏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45页。

^② “轴心时代”出自雅斯贝尔斯（Karl Jaspers, 1883—1969）观点，约指公元前500年左右—公元前800至200年。卡尔·雅斯贝尔斯：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7—29页。

^③ 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287页。

^④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裴骃集解，司马贞索隐，张守节正义，中华书局1999年版，第2485页。

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，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辟犹水火，相灭亦相生也。仁之与义，敬之与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。’今异家者各推所长，穷知究虑，以明其指，虽有蔽短，合其要归，亦《六经》之支与流裔。”^①吕思勉总结先秦之学术源流及其派别时称：

先秦诸子之学，《太史公自序》载其父谈之说，分为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益以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，是为诸子史家。其中去小说家，谓之九流。《艺文志》本于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始六艺，实即儒家。所以别为一略者，以是时儒学专行；汉代古文学家，又谓儒家之学，为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之道，而非孔子所独有故耳，不足凭也。诸子略外又有兵书、数术、方技三略。兵书与诸子，实堪并列。数术亦与阴阳家相出入。所以别为一略，盖以校书者异其人。至方技则一医家之学耳。故论先秦学术，实可分为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、兵、医十二家也。^②

刘歆、班固描述的是周室衰微、王纲解纽之后，道术分裂的情形，但是在他们的主观建构中却通过将百家起源归于王官，力图求得一个统一的源头。刘歆《七略》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追根溯源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……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……阴阳家者流，盖出于羲和之官……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……名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……墨家者流，盖出于清庙之守……纵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……杂家者流，盖出于议官……农

^① 班固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汉书》卷三十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46页。

^② 吕思勉：《先秦学术概论》，《民国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编：《民国丛书·第四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2—13页。

家者流，盖出于农稷之官……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。”^①这就是九流十家出于王官说。其说虽然对九流十家分别言之，实则则是以九流十家都同出于王官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等典籍虽未必与上述官守一一对应，但亦当为王官所守。所以诸子出于王官说与诸子出于《六经》之支与流裔说，实际上并不矛盾。章太炎在《检论》、《诸子学略说》等书中，也提出上古“官师合一”，“官修其方”，“官宿其业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），称为世官世畴，有其文化或技艺上的承传。而刘、班的思考在汉的背景下，体现出当时对于学术正统知识归类的一种思路，即一分为多的道术分裂的想象，而自汉之后，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，多样化的百家争鸣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，经过孔子系统化了的礼仪制度知识系统，再一次将这些分散流播的“流裔”合意。在“合一分一合”的辩证中，有关知识的正统性与合法性逐渐清晰起来。

在原典儒学那里，对于知识的态度是辩证的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^②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^③焦循《论语补疏》中说：“圣人一贯，则其道大。异端执一，则其道小。”^④朱熹《论语集注》中引杨氏语解释说：“百家众技犹耳目口鼻，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，非无可观也，致远则泥矣，故君子不为也。”^⑤但是，另一方面因为有经世致用的追求，所以又形成了博物的另一面。汉儒扬雄《法言·君子》有言：“通天、地、人曰儒”，“圣人之於天下，耻一物之不知”^⑥。唐刘知几《史通·杂说中第八》：“盖语曰：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

① 班固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汉书》卷三十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28—1745页。

② 孔子：《论语·为政》，杨伯峻：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7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200页。

④ 焦循：《论语补疏》，《皇经集解》，广州学海堂，清咸丰十一年。

⑤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88页。

⑥ 扬雄：《法言·君子》，汪荣宝：《法言义疏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514、517页。

沉。又曰：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。是则时无远近，事无巨细，必藉多闻，以成博识。”^① 博物的一面尽管没有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，却是一个绵延接续、不曾断绝的小传统。

儒学为主导融合其他诸家的一些治术内化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，从而使得原本丰富繁复的各类知识系统、博物之学遭到压抑。有志于道的“士”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作为“三不朽”，但是“立言”也并非立文学之言，而是“为天地立志，为生民立道，为去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^② 的圣贤家法。这成为一种大传统，虽然此后各朝代不同，明经取士或者科考诗赋或有不同，策论时文与经济八股时有侧重，但总体而言士人经史子集的知识等级观基本没有大的触动。这样说有失简略，不过总体格局即是如此，辞章文学始终没有进入到士人的正统知识系统之中。

中国古代学术，自晋唐以后分为经史子集四部。如今讨论的“文学”内容很多包含在子学和集部的范围之内。而子学本身又如同刘勰所说：“诸子者，人道见志之书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。百姓之群居，苦纷杂而莫显；君子之处世，疾名德之不章。唯英才特达，则炳曜垂文，腾其姓氏，悬诸日月焉。”^③ 先秦诸子的著述，内容极为宽泛，处士横议，无奇不有，只要能“人道见志”，只要有言论载籍，有一人即有一子。然而大致划分，诸子又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为专门的技艺之学，比如农家、兵家、纵横家，或李斯所说卜筮、医药、种树之类；一类为系统、综合的学说，形成上至哲学、下至政治纲领的完整体系，比如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。“集”则是四部中确立最晚的，无论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和权威意味均以经史为旨归，其中有部分在现代被追认为“文学”的内容恰恰是最不受重视的诗词歌赋。

直到所谓的“文学自觉”的魏晋时期，对于文学体裁的辨析依然是众说纷纭的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提出了“奏议”、“书

① 刘知几：《史通全译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54页。

② 张载：《张子语录》，《张载集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320页。

③ 刘勰：《文心雕龙》，见周振甫《文心雕龙今译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154页。

论”、“铭诔”、“诗赋”等四科八体^①；陆机的《文赋》扩充为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箴、颂、论、奏、说十体^②；挚虞的《文章流别志论》^③、李充的《翰林论》等也各有说法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“论文叙笔”，则以“文”和“笔”为别，分为35种文体。所谓“文”，指重在抒情言志，讲求音韵文采的作品，如楚辞、诗、赋、乐府等；“笔”主要指政治学术性的，不重音韵文采的作品，如史传、诸子百家之文等。不过，无论“文”、“笔”，总需要找到其本体性的根源：“论、说、辞、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；诏、策、章、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；赋、颂、歌、赞，则《诗》立其本；铭、诔、箴、祝，则《礼》总其端；纪、传、铭、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。”^④也即是说，中国的“文学”从来都没有“纯粹”过，其传统一向以“道”、“圣”、“经”为旨归。这种知识的等级格局，贯穿于科举制度的始终。直到晚清，文学观念依然颇为含糊，这个时候“文学”这一概念逐渐通过日本对于西方文学观念的译介，而慢慢获得其现代含义。但是文学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过程，并且不时会有迂回、反复和重新勘定。

当然，文学的知识观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，被后来文学史书写者普遍接受的文学观念方才逐渐稳定下来。洋务派受朴学影响甚深，强调的是文章的实用而反对华丽的形式和过分的抒情，且视文学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，并不重视。郭嵩焘在1854年宣布不再作诗，在1862年所作诗集《养知书屋诗集自序》直接认为：“今之为诗文者，徒玩具耳，无当于身心，无裨于世教，君子固不屑为也。”^⑤曾国藩从经世的角度重

^① 曹丕：《典论·论文》，郭绍虞、王文生主编：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第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58—159页。

^② 陆机：《文赋》，郭绍虞、王文生主编：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第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70、175页。

^③ 挚虞：《文章流别论》，郭绍虞、王文生主编：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第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90—193页。

^④ 刘勰：《文心雕龙》，见周振甫《文心雕龙今译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30页。

^⑤ 郭嵩焘：《郭嵩焘诗文集》，岳麓书社1984年版，第559页。

视文章，“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”，得桐城派峻洁之诣，薛福成认为“其为文，气清体闲，不名一家，足与方姚诸公并峙，其尤屹然者，几欲跨越前辈”^①。即便如此，他的气象也依然还是桐城派的规矩方圆，不能脱出模拟古人的局限。而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清末重要知识分子，对文学都相当轻视，几乎没有对当时的诗文创作发生影响。“无用”的诗文歌赋在峻急的时代氛围下、在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那里，自然毫无地位。

但是，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布，中国的既有正统受到冲击，异端和边缘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，文学和历史这些原本在古典知识结构中地位低下的类型，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体被前卫的知识分子所鼓吹和利用。

到戊戌变法时代，文学的无用之说因变革时代的要求而显得急切激进。康有为认为，“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，故铜聪塞明而才不足用”^②，“以无益之虚文，使人不能尽其才”。而擅长诗词文章的谭嗣同，则自言像明末清初的侯方域一样悔其少作，因为“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”^③，文章不过纸上苍生而已。1896年，谭嗣同金陵刊刻的《莽苍苍斋诗自叙》中说：“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，犹不自惩，而为此无用之呻吟，抑何靡与？三十前之精力，敝于所谓考据辞章，垂垂尽矣。勉于世，无一当焉，愤而发篋，毕弃之。”^④梁启超在1898年给林旭做传时写道：“（林旭）长于诗词，喜吟咏，余规之曰：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，偶一为之可也。若以为业，则玩物丧志，与声色之累无异。方今世变日亟，以君之才，岂可溺于是。”^⑤亡国灭种的焦虑，使得这些维新志士在实用主义的经世观下对诗文爱深责切，而在思想的深处

① 薛福成：《〈寄龛文存〉序》，丁凤麟等编：《薛福成选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40页。

② 汤志钧：《康有为政论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51页。

③ 谭嗣同：《三十自纪》，《谭嗣同全集》，三联书店1954年版，第204页。

④ 谭嗣同：《莽苍苍斋诗自叙》，《谭嗣同全集》，三联书店1954年版，第154页。

⑤ 梁启超：《戊戌六君子传》（1898—1999），《饮冰室文集点校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52页。

其实并非轻视文学本身，而是刻意贬低那些不能为世切用的怡情养性的诗文。

正是在实用观念的笼罩下，“文学”地位的提升才显得顺理成章——一旦当知识分子发现文学可资利用的潜质之时，它的意义也就变了。在万木草堂讲《文章源流》和《文学（并讲八股源流）》时候，康有为还秉持“学者当以义理心性气节为本，故《论语》谓余力学文”^①的观念，但是到1896、1897年左右，“诗界革命”兴起，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”被认为是一条可以调和的道路。在本/末、道/器之间，如果赋予诗文以载道之用，那么它的道德地位就获得了提升。诗界革命并不成功，但却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，那就是边缘的、底层的、被压抑的文化因素得以进入主流知识系统。

在诗界革命时期，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梁启超创办《新小说》期间，黄遵宪向他建议，刊物发表的诗歌应“斟酌于弹词、粤讴之间”，或三言、或五言、或七言、或九言、或长短句，名之为杂歌谣^②。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，除刊出《爱国歌》、《新少年歌》等歌词外，又发表了《粤讴·新解心》和《新粤讴》等作品。对于这些新创作的歌谣，梁启超记载：“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，热诚爱国之士也。游宦美洲，今不欲署其名，顷仿粤讴格调成《新解心》数十章……芳馨悱恻，有离骚之意，吾绝爱诵之。其《新解心》有《自由钟》，《自由车》，《呆佬祝寿》，《中秋饼》，《学界风潮》，《唔好守旧》，《天有眼》，《地无皮》，《趁早乘机》等篇，皆绝世妙文，视子庸原作有过之无不及，实文界革命一骁将也。”^③这些歌谣自然也包含了百越族群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品，可以想象，如果不是借助于这种“革命”，它们将依然不会进入到

^① 康有为：《文学》，董士伟编：《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51页。

^② 黄遵宪：《致饮冰主人手札》（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），郑海麟、张伟雄整编《黄遵宪文集》，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71页。

^③ 梁启超：《饮冰室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，第52—53页。

文学史的叙事之中。

诗界革命的最高成就，大约就如同梁启超所说：“公度之诗，诗史也。”^①但是显然“诗”作为正统高雅的题材，其本身因为形式音律等的限制，很难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。1902年，梁启超在《新小说》创刊号上发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文章疾呼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……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”，因为它有“熏”、“浸”、“刺”、“提”的功效，因而“为文学之最上乘”^②。这样一下子就把原处于社会文学结构边缘的小说推到中心地位，把原只流行于俗的小说变成知识阶层自觉运用来进行觉世新民、疗救社会的利器。整个文学在社会知识体系的格局也产生了变化，在学习采纳西学的大背景下，它从原本抒情言志、载道娱乐的小道，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，一跃为具有宣传、提高、升华、启蒙、团结作用的现代性言说工具。

文学地位的提高，同边缘知识人的崛起、史学的提升相互作用^③，一些边缘的文化因素于是得以有展现之日。少数民族文学由文化（民俗、制度、礼仪、口头传统）开始，虽然艰难，也已经慢慢在文学和历史的叙事中崭露头角。这是各种合力齐头并进、彼此互动的结果，而在这种知识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是后来被命名为保守、洋务、维新、革命以及各种名目的知识分子。

考虑到晚清至民国的具体情形，不免让人想起曼海姆（Karl Mannheim, 1893—1947）分析的知识阶层社会学的四个指导性问题的，即：1. 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；2. 知识分子独特的社团；3. 知识分子的上下流动性；4. 知识分子在一个较大社会中的功能。^④

① 梁启超：《饮冰室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，第63页。

② 梁启超：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《饮冰室文集点校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758—760页。

③ 有关经史博弈以及史学地位的上升与下降，参见罗志田《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》（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）、《裂变中的传承：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》（中华书局2003年版）相关论述。

④ 曼海姆：《知识阶层的历史角色》，苏国勋，刘小枫主编：《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Ⅲ——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》，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，第413页。

前两个与知识阶层的内在特征相关联,后两个涉及它与总体社会过程的关系。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是风雨如晦、国病民瘼、内乱外患交相并作的社会,不同出身和追求的知识分子因而发生了分流,转型的社会提供了更广阔的流动性——尽管科举制度废除似乎断绝了原本最理想的社会流动途径,但却促使了第一代自由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,这些处于边缘的先行者迅速通过对于话语的争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,参与并且改造了中国的历史叙事、知识结构、话语方式,并实际影响了现实中历史的行程,这其中也包括文学史这种历史叙事。

二 文学史的形成及权力

中国文学史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受到史学的影响巨大,这是一种传统的惯性,同时也是文学如果要化身为正典(canon)和经典(classic)的可供传播、教学和继承的知识所必然要走的道路。因而从根本上来说,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著者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都是把“文学史”作为“历史”的一个分支,而“文学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其他器物、制度、风俗、技艺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,只是一个言说的对象。既然如此,从史观而言,文学史就必须遵从“历史”的法则。如同戴燕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历史时,发现的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,即历史学的影响、教育体制、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等,并概括道:“中国文学史的与历史结盟,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,通过教育,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,正统论的辨析,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力彻底联系在一起,而一套经典及经典性阐释的确定,则使它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。1920—1930年代,曾经是中国文学史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,文学史的空前活跃,逼迫着传统方式的文学研究和教学退出了历史舞台。”^①

传统史学的原则是秉笔直录、资鉴后世。关于古代史学的渊

^① 戴燕:《文学史的权力·前言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11页。

源,《汉书》称:“古之王者世有史官。君举必书,所以慎言行,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,事为《春秋》,言为《尚书》,帝王靡不同之。”^① 刘勰继承这个说法(尽管在关于记言和记事上有所不同):“开辟草昧,岁纪绵邈,居今识古,其载籍乎。轩辕之世,史有仓颉,主文之职,其来久矣。《曲礼》曰:‘史载笔。’‘左右’史者,使也;执笔左右,使之记也。古者左史记事,右史记言者。言经则《尚书》,事经则《春秋》也。”^② 这源自《周礼》中“五史”的职守,上古又有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的典章。《汉书》记河间献王德“信而好古,实事求是”^③的治学原则,实际上就是对于实证的强调,而最为典型的实例莫过于有关“良史”、“实录”的记载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说:“太史书曰:‘赵盾弑其君。’以示于朝。”孔子称:“董狐,古之良史也,书法不隐。”班固称司马迁:“……良史之材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^④ 古代史学不是不可以有“论”,有褒贬评价,但是首先要有真实的记录。“实录”、“良史”二语,足以说明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。

刘勰所说的“载籍”、“载笔”、“主文”,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,真实可信。刘知几亦言:“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,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。”^⑤ 作为一种叙事,刘知几同样认为:“夫史之称美者,以叙事为先……书功过,记善恶,文而不丽,质而非野”,“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,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,简之时义大矣哉”^⑥。这里也隐约表达了子学与史学各自不同的原则——博闻与实录,诸子学是主于思想、议论、博学多闻,史学是主于

① 班固:《汉书·艺文志》,《汉书》第六册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715页。

② 周振甫:《文心雕龙今译》,中华书局1995年版,第140页。

③ 班固: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,《汉书》第八册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2410页。

④ 班固: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,《汉书》第九册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2438页。

⑤ 刘知几:《史通·外篇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165页。

⑥ 同上书,第318、326页。